

※書刊評介※

〈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簡評

楊晉龍*

此文係林慶彰老師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八日早上，在中國文哲研究所進行的學術演講，原是林老師準備在日本長崎舉行的九州中國學會上進行專題講演的口頭稿。此文寫作的目的有二：一則確認自己係在中國經學史研究領域中，首位提出「回歸原典運動」的學者；其次則探討中國經學史上自唐代以來，不同階段「回歸原典運動」的成因與內涵。論述的重點主要放在第二部分「回歸原典運動」內容的分析探討。文中認為「原典」乃是具有神聖性與權威性的典籍，判斷是否為「原典」的標準有三：一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集團」的著作或相關的著作；二是書中的道理具有永恆性，可作為一切義理是非判斷的最後判準；三是書中文辭歷久彌新，寫作技巧高明，可為寫作文章最佳的學習典範。亦即這些寫作技巧高明且具有人間永恆道理的書籍，或者與「聖人集團」相關；或者經過「聖人集團」中某位聖人的整理，其中當然以孔子最具關鍵性的地位。例如根據這個標準而成立的經典《十三經》中，《詩》、《書》是經過孔子刪定；《春秋》、《易傳》與《孝經》是孔子的作品、《春秋三傳》是闡發《春秋》的作品；《儀禮》是孔子所傳；《禮記》是孔子弟子解釋《儀禮》的作品；《爾雅》則是孔子學生子夏傳下來的作品；《論語》是記錄孔子言論的作品；《孟子》是闡發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作品等等。此文根據前述標準，則唐中葉到宋代初年，如啖助(724-770)、趙匡、陸淳等的經學觀，以及韓愈(768-824)等發起的「古文運動」都算是一種回歸原典運動的表現；接著明末清初考辨《易》圖、《古文尚書》、《周禮》、《大學》、《中庸》等等的真偽，也是一種回歸原典的運動；最後則清末民初胡適之(1891-1962)、顧頡剛(1893-1980)等五四新文化人物視「經書」為史料，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追求其「本來面目」的辨偽，也是一種回歸原典的運動。

不過根據筆者粗淺的觀察瞭解，對於「聖人集團」的認知固然是整個中國傳統的共識，但在不同時間中實際尊崇的「聖人集團」的聖人成員，還是有一些區別，林先生是採取「回顧追認」的角度加以定義，似乎還可以再加斟酌，例如在宋代確定所謂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的「道統」之前，孟子實際上並沒有納入「聖人集團」之中，這其實可以根據各個朝代「國家祭典」的崇祀對象加以瞭解，若就不同朝代崇祀的聖人而言，則可知對於聖人的認知標準，實際上有一個相當明確的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不同階段的聖人觀大致是：孔子以前是堯、舜、文、武、周公→漢代開始則是孔子→漢代後期至唐代是周孔→宋代以後至今是孔孟等，因此從現代「回顧追認」的角度，以《十三經》為經典固然沒有問題，但此種不同時間的不同聖人標準，應該比較「歷史的」加以必要的區分，以免有把實際成立於宋代以後的《十三經》，誤認為從經學史一開始就成立的誤解。

再者，此文研究的立基點主要是現代學科意義下「文獻學」的角度，但傳統經學「原典」的判準，實際上並無法脫離「義理學」的關照，傳統經學如果脫離「義理」內容的道德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合法的成立，亦即不能再稱之為經學。此文卻由於基本認知上的混淆，因而將民國以來完全排除義理內涵，主要是立足於現代史料考辨立場的辨偽學，不當的與中國傳統經學追求聖人之道的義理意義下的辨偽學混為一談，因而把陳獨秀(1879-1942)、胡適之與顧頡剛等一類歷史文獻考辨的工作，當作追求經典聖人意義的回歸原典的行為，因而造成論述上的矛盾。實際上五四新文化人物考辨的目的，正好與本文原典標準強調的經學回歸原典運動的目的相反，傳統經學回歸原典的目的是以求得聖人寄託於經典中的義理，因而可以在實際的生活層面應用為目的；新文化人物卻根本不同意經書具有什麼神聖性與權威性，從來也不認為經書有什麼值得探索的義理，說經書中涵蓋有可以指導現代人實際生活的價值，對他們而言更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大笑話。新文化人物認為本文指稱的所謂「原典」，不過是一堆有待整理的、內容記載真偽摻雜的，古代留下來雜亂一團糟的一般資料性的歷史文獻紀錄而已，新文化人物考辨經書真偽的目的，正是要解消或消滅經典中所謂聖人義理的「附會」，以回復經書原本的文獻學意義下歷史材料的基本性質，形式方法固然相同，目的卻完全相反。甚至還可以進一步的推測，新文化人物此一「解消原典運動」的目的，正是要作為引入西洋文化的準備，就是準備另外建立一個新的「經典」，因此絕對不能將這種「離棄經典」的行為，

納入傳統經學意義下的「回歸原典運動」之中。因為實際上討論「回歸原典」，可以有兩個相關，方向卻不太相同的角度：一是文獻學的角度，就是從文獻是否為某位聖人編著的真偽考辨的立場進行分析探討；不過考證的目的是要確定書籍文本的正確性？還是要確定書籍文本記載內容的正確性？或者是要考辨書籍作者的真偽性？因為這三者的目的並不同，有可能書真而記載也正確但人卻假，也有可能書假而記載與人皆真，也可能書真人真而記載不真等等；一是義理學的角度，就是從義理是否符合聖人道理的是非對錯立場進行分析探討。就傳統的考據學而言，文獻考辨的目的其實就是要確定是否符合聖人義理的問題，文獻考辨根本不可能脫離聖人義理的追求而獨立存在，因此就經學而言，如果僅注意到文獻考辨的「回歸原典」，卻沒有將義理是非納入考慮的「回歸原典」，實際上並不符合此文標準之下真正的「回歸原典運動」，若是非要將清末民初以來新文化人物的辨偽行為納入前述「回歸原典」的探討不可，則就只能從形式的相同點而論其「離棄原典」轉變的原因，並且還可以因此一轉變，進而探討經學面對「現代學術」如何轉型因應的問題，如果可以將「清末民初的回歸原典運動」的小標題，改為「清末民初解消原典的回歸原典運動」、「清末民初離棄原典的回歸原典運動」或「清末民初回歸原典運動的歧出：以史料考辨為中心的解消原典運動」、「清末民初回歸原典運動的歧出：以史料考辨為中心的離棄原典運動」，則似乎較為恰當。

實際上清末民初以來新文化人物的主張雖是學術主流思潮，但傳統意義下的經學也並沒有完全消失，只不過從主流學術的位置退下，而與其他非主流學術居於平等地位而已，然老虎雖死而餘威猶存，其潛在的學術影響力依然不容忽視，林毓生先生(1934-)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一文中，就有過精采的分析，以為五四新文化人物在「思想內容層次」上固然已經大為改觀，但在「思想模式層次」上則依然「不知不覺地繼續持有傳統的思想模式」¹，即使是激烈的反傳統人物，因為生活在傳統經典權威勢力下，實際上還是無法完全擺脫如同「遺傳基因」的傳統之潛在影響，因此有關「清末民初的回歸原典運動」還是可以進行討論，但對象則不應該是陳獨秀、胡適、顧頡剛等等新文化人物，應該注意的是如清末以來所謂「今文學」與「古文學」的學者，如康有為(1858-1927)、

¹ 見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頁139-196，引文見頁171。

劉師培 (1884-1919) 等相類似立場的人；還有像王國維 (1877-1927) 等一類所謂「遺老派」的學者；以及所謂「廣義的現代新儒家」的一批人，例如馬浮 (1882-1955)、熊十力 (1885-1968)、梁漱溟 (1893-1988)、錢穆先生 (1895-1990)、王靜芝先生 (1916-2003)、高明老師 (1909-1992)、孔德成老師 (1920-)，甚至蔣中正 (1887-1975)、陳立夫 (1900-2001) 等等也可以斟酌加入。

宋代出現《易》圖與明代出現《申培詩說》、《子貢詩傳》、《石經大學》等所謂古代的「偽書」，從考據學或文獻學的角度看，固然是一種造假行為，但就其所以造假的理由與目的而言，正可以用來證明「回歸原典運動」的實際存在，如果當時社會上沒有「回歸原典」的濃厚氣氛，就不可能出現此種假造「古代經典」的行為，並且還被「接受」的事實。

此文中也提到唐代中葉以後，由於士子只讀「傳」而不讀「經」，因而激發了「回歸原典運動」，但是唐代科舉考試分成好幾種，至少其中有一種考試需要「帖經」，此種考法就像現代的「填充題」，就是將經書文本中幾個字黏貼起來，考生必須把正確的經書文字填進去，如果經文背誦不熟，根本無法作答，所以除非先證明唐代科舉考試有所改變，否則要說唐代中葉以後的士子不讀「經」文僅讀「傳」說，恐怕還需要進行必要的論證。

同樣的問題出在此文對明代以後科舉考試的論述上，因為《四書》屬「下學」的讀物，《五經》則屬「上達」的讀物，因而科舉考試特別重視《四書》，鄉試以下的考試，《四書》列為必考，《五經》則只要選考一經即可，因而造成士子都讀《四書》而少讀《五經》的結果，這個說法其實相當的似是而非，因為當士子通過鄉試而參與殿試考試的時候，可以發現殿試的題目是《四書》《五經》的內容都有，因此明代以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如果像一般人所說，沒有閱讀全部的《五經》而只讀其中的「一經」，那將如何參加最重要的殿試？相信當時參與科舉考試會把自己考試的目標只鎖定在鄉試上，不準備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人，應該是非常稀少，如果此一推測無誤，則明代以後參與科舉考試的士子怎麼可能只讀《四書》與「一經」呢？這樣的認知顯然大有問題。

再者，如果排除此文現代「文獻學」的角度，回歸傳統經學純粹義理的角度來討論「回歸原典運動」，根據《漢書·劉向傳》收錄的劉歆 (?-23)〈責讓太常博士書〉中所謂「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與「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的說辭進行分析，則劉歆是否也可以算是在進行一種「回歸原典」的運動？

似乎也還可以略加斟酌。如果此一從純粹義理角度「回歸原典」的推測屬實，則漢代古今文之爭，似乎也可以斟酌納入追求何者纔是正確傳達聖人義理的「回歸原典運動」的考慮之中。

北宋理學家重新建立「道統」的行為，當然是一種刻意的人為「造神運動」，建立「道統」的意義，正是要從文獻資料上，確定聖人經典文本的範圍，最終則是要確定那些是表達聖人義理的正确內容。因而從義理學的角度而言，實際上也可以納入「回歸原典」運動中討論。

明代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 (1473-1530)、何景明 (1483-1521)、邊貢 (1476-1532)、康海 (1475-1540)、王九思 (1468-1551)、徐禎卿 (1479-1511)、王廷相 (1474-1544) 與嘉靖、萬曆年間李攀龍 (1514-1570)、王世貞 (1526-1590)、謝榛 (1495-1575)、盧柟 (1535 年前後)、宗臣 (1525-1560)、豐坊 (1500?-1570?)、徐渭 (1521-1593)、楊慎 (1488-1559)、王廷陳等所謂前後七子，在文學的創作上，主張「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不讀唐代以後詩文著作的「復古運動」，要求學者模擬漢代以前的文章詩作，最終希望詩文都能夠回到儒家經典的觀點。就傳統經學義理要求精神的角度而言，這也是類似於唐代韓愈和宋代歐陽修 (1007-1072) 等共同完成的「古文運動」的一種「回歸原典」的運動，就文學注重創作的表現而言，「復古運動」固然有造成模擬風氣之弊，但此一因為「崇古好古」而「一味膜拜經典詩文」，進而「模擬古人」的「仿古」行為，就其內在精神而言，豈非也是一種不同意義下的「回歸原典運動」？同時正是在此「回歸原典運動」精神的氣氛影響下，更促成讀書人在程朱「宋學」的潮流與風氣下，能夠逐漸重視漢唐注疏的「漢學」，探討明代「漢學」的興起，絕不能不注意此一文學「復古運動」提供的學術助力因素，即使不能納入直接針對經學文本而要求「回歸原典」的一種「回歸原典」的運動，但恐怕也不能不重視其間接促成「回歸原典」運動在社會思潮內的實際助力。這段期間正好也是《十三經注疏》的合刻本，在楊慎等人的積極鼓勵下出現的時間點，則探討中國傳統經典的「回歸運動」，似乎有必要將明代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納入探討的範圍，至少也可以作為明代經學回歸「古代」漢學的一個重要社會背景看待²。

² 可以參考史小軍：〈明代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與儒學復興〉，《人文雜誌》，2001 年第 3 期，頁 105-110 的討論。

再者，明末清初西洋基督教傳入中國，傳教士為爭取教義在中國文化中的合法性，因而也透過「回歸經典」的訴求，指責漢宋儒者解讀儒家經典歪曲聖人本義，以便可以透過重新解釋《十三經》的方式，確定中國經典早已經有上帝的神聖指示在其中，因而作為中國人應當改信基督教的根據。基督教傳教士此種藉傳統經典以傳教的手段，固然與實際經學上「回歸原典」的基本訴求有別，但似乎也不能不納入「回歸原典運動」之中，因為基督教此一「回歸儒家原典」以傳教的手段，從明末以來就一直沒有間斷，只是沒有受到一般中國經學研究者的注意而已；而筆者近幾年正在進行的「宗教與詩經學」的研究計畫，剛好注意到此一現象，或許也可以提供林老師參酌。

清代乾嘉年間興起的漢學考據學，乃是民初新文化人物現代歷史考據學的源頭之一，然而乾嘉考據學的辨偽考證目的，就他們的意義而言，正是要回復經典被宋儒等後代經師誤解之前的原貌，亦即追求經典純粹「本義」的一種行為，此種行為恐怕也不能排除在「回歸原典運動」之外。

本文對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出的觀點，在瞭解判斷上應該還可以再加斟酌，因為五四新文化人物所謂「國故」或「國粹」中的「國」，實際上是西洋傳入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的概念，所謂「人民」也是指現代「民族國家」的「民」的概念，已經不是傳統中國「一家一姓」意義下的「朝廷」與「百姓」關係的概念了。

顧頡剛成名的所謂「層累的歷史觀」，根據筆者粗淺的分析，筆者很懷疑這只是顧頡剛將當時普遍流傳的「進化論」的發展過程「逆轉」過來說而已。因為「進化論」說生命受到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因而成為現代這個樣子，基本前提的假設是「由簡單而趨向於複雜；由單一而趨向於多元」，倒過來看則今天存在的就是一種已經「複雜化」與「多元化」的「單一」與「簡單」的發展結果，「單一」與「簡單」而不摻入任何「添加物」的就是原來的真面目，或者說是事物的本義或真相，因此只要撥開或消除那些促使其複雜與多元的「添加」因素，則原來的真面目或本義就會如實顯現。這就如同家傳的一幅祖先的畫像，幾百年來的每一代祖先，都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像像，在這祖先的畫像上加添一些新的內容，幾百年後看到的祖先畫像，當然就不是原先的祖先畫像，顧頡剛「層累歷史觀」意義下的辨偽，就是要有效而正確地撥除那些後代加添的東西，讓祖先畫像恢復本來的面目，這樣的思考角度當然沒錯，然而問題則是畫像的本來面目固然恢復了，但畫像是否真的是祖先

的畫像？或者有多少分的相似度？這恐怕不是顧頡剛「層累的歷史觀」意義下的考辨所能解決；除此之外，畫像還是畫像，絕對不能夠直接就把畫像當成祖先自己，這應該是非常明白的事情，顧頡剛「層累歷史觀」的問題就在於所得「真相」只是去除「添加物」的「真相」，無法保證一定是毫無問題的絕對性意義下的「真相」，最多也只能保證比較趨近「真相」而已。換言之，「層累歷史觀」意義下進行的考辨，很容易誤把祖先畫像當作祖先的本尊，因此所得成果依然只是「近似值」而已，但不少「疑古學者」卻刻意將其誇大成毫無問題的「真相」，其實是大有問題的觀點。以上粗淺的認知，希望對林老師的文章有點正面的意義，如果說錯了，就請多多諒解啦！